

文選台文卷第一

文選版本擷英

梁昭明太子蕭統選

賦甲

京都上

兩都賦序 班固

范志新／編撰

或曰賦者古詩之流也昔成康沃而頌聲寢王澤竭而詩
不作大漢初定日不暇給至於武宣之立乃崇禮官考文
章內改金馬石渠之署外興樂府協律之事以興廢繼絕
潤色鴻業是以衆庶說豫福應尤盛白麟亦出於房寶鼎

貴州人民出版社

文選版本輯要

馬其新、陳鳳

廣西人民出版社

37.685
330-1

范志新 編撰

文選版本擷英

貴州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文选版本撷英/范志新著. —贵阳:贵州人民出版社,
2005.3

ISBN 7-221-06911-5

I. 文... II. 范... III. 文选—版本—研究
IV. G256.2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26776 号

文选版本撷英

范志新 编撰

出版发行:贵州人民出版社

印 刷:贵阳科海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:新华书店

版 次:2004 年 12 月第一版

印 次:2004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

开 本:850 毫米×1168 毫米 1/32

印 张:11.25 字数:230 千

印 数:1~1000 册

书 号:ISBN 7-221-06911-5/G·2340

定 价:25.00

曹序

《文選》一書在我國文學史上起過巨大影響。唐李善《上文選注表》稱「後進英髦，咸資準的」；宋陸游《老學庵筆記》亦有「《文選》爛，秀才半」之語。根據史籍的記載，此書被雕版印刷始於五代毋昭裔，所刊當為五臣注本；至宋天聖、明道間又有國子監刊李善注本；其后又有所謂「六家注」（即「五臣」、李善注）和「六臣注」（李善、「五臣」注）。長期以來，我們研讀《文選》，往往只見到兩種版本：清胡克家覆宋尤袤刊本，即「胡刻本」和《四部叢刊》影印宋刊「六臣注」（這個本子實即所謂「建州本」）。至於一般的讀者，大約所見者僅限「胡刻本」一種，因為自清中葉以來，所有的刻本，石印本、鉛印本都無不以此為底本。至於「胡刻本」是否符合蕭統、李善的原貌，雖也有一些專家進行過探討，但由於能見到的版本有限，往往只能作一些推測。至於宋元以來的一些刊本和唐人的寫本雖有不少已經散佚或殘缺，但殘存之本，仍足以訂補今本之失和發現不少異同；何況有的版本事實上并未遺失，而且即使有所缺損，還不致影

響全書的價值。這些寫本的刊本，大抵藏於國內外一些圖書館中或某些私人手中，一般的研究者幾乎很少知道。以『五臣注』本為例，過去我們往往認為單『五臣注』自『六臣注』出現後，已歸湮滅。記得上世紀六十年代，曾經傳聞南方某圖書館藏有一部，不少人到處詢問，仍不知此事是否屬實，只能不了了之。其實『五臣注』的刻本并未散失，就目前所知，臺灣省就有一部南宋陳八郎刊本，為王同愈、蔣祖詒舊藏并曾加以影印，并有影印本贈送大陸個別研究單位和個人。『陳八郎本』還有個影抄本，藏於北京大學圖書館，可是人們過去亦很少有人知道。李善注本的情況，亦與此相仿。過去的學者對李善注的流傳情況也缺乏了解。例如清代的《四庫全書》編者，就沒有見到過宋刊的李善注本，而僅見明末的汲古閣刊本，因此提出了今本李善注是後人從『六臣注』本中分出的錯誤結論。後來北宋國子監刊本的殘本和南宋尤袤的初刻本的出現，則證明了此說之誤。至於敦煌寫本殘卷以及現藏日本《文選集注》殘本、古抄無注本，還有韓國奎章閣六家注本及日本、韓國所藏朝鮮舊刻單『五臣注』本，均是近年來才為我們所知。這些寫本和刻本的發現，無疑地對《文選》版本的研究和《文選》學史的研究會起到巨大的推動作用。因為要對某個問題進行比較深入的研究，其首要條件就是要盡可能多地掌握有關材料，加以比較、分析和綜合，才能得出比較近於事實的結

論。盡管對有關材料的掌握，我們雖力求其全，但由於條件的限制，總難做到完全窮盡。不過，力求其完備，總是衡量一項科研工作的主要條件之一；而且學術的進步也往往是以新材料的發現為起點。關於《文選》版本的搜集，到目前為止，從事這一辛勤研究的人還不很多，這是因為這種工作有很高的難度，即以對國內各圖書館的館藏作一次普查而論，就要花費極大的精力和時間。然而不論對《文選》版本的研究本身或相關的版本學史、《文選》學史等等學科，這種研究都是必不可少的。以我所知，目前國內有不少學者正計劃進行《文選》學史的研究。顯然，對這些研究者來說，范先生這部《文選版本擷英》，會對他們有很大的幫助。因為只有較全面地掌握了現存歷代各種《文選》版本的面貌及存佚狀況，才能據以了解各個時代選學的興衰以及當時選學研究的特點。也只有較全面地掌握現存的各種版本，才能進一步考校異同，進行彙注彙校的工作。因此范先生此書，可以說是為今后選學研究的許多工作奠定了極好的基礎。

范先生這部《文選版本擷英》，不但對《文選》研究，而且對我國的雕板印刷史研究也有巨大的貢獻。因為范先生此書所收書影，雖僅限於《文選》一書，但通過這些書影，也同樣可以幫助我們了解各個時代雕板印刷技術的發展和演變。因為每個朝代刻書，其款式、字體和紙質、墨色等等都有很大的不同。通過這些

方面，專家們往往可以鑒別出某本書的刻印時代，是原刻還是翻刻。這是一種專門之學，一般的《文選》研究者或古典文學研究者往往對此缺乏了解。以筆者個人來說，就是一個門外漢。過去聽一些專家談到宋刊本字體多近歐、顏；元刊多近趙；而明代尤其明中葉以後的字體又有什麼特徵等，往往只是到《四部叢刊》、百納本《二十四史》等影印本中去找實例。至宋元明的刻本，基本上沒有見過，即使在圖書館的善本室中偶然見到，也只能翻閱，無法細看。從范先生此書的說明看，他是下了很深的功夫的。從他論明代丁觀刊本與宋本的區別的話看來，他對不同版本的細微差別都能明辨，足見其眼光不凡。我們知道，范先生和我們一樣，并非藏書館，而宋明善本多藏各圖書館中，要較精深地掌握這些特點，更需無數精力。

我忝為范先生同鄉，但少年即負笈北方，無緣識荆。一九八八年夏，始相見於長春，去秋又在鎮江晤談，對范先生學識之博和為人的真誠深感欽佩。今得讀他的大著，自覺獲益匪淺。謹略獻蕪詞，未知有當否，敬祈 范先生指正！

曹道衡謹序於北京中國社會
科學院文學所時年七十有五

二〇〇三年八月十六日

序

《文選》的雕印，除受經濟、政治、文化等大背景的制約外，具體說來，與選學的盛衰、印刷術的發展，關係最密切：選舉決定其雕印的內容，印刷術則規範其載體形式和藝術效果。影響力尤以後者為大。

隋蕭該撰《文選音》專門之作，是選舉之濫觴，隋唐間曹憲撰《文選音義》，講學江淮間，繼起者有許淹、李善、魏模、公孫羅等，講學、撰述，由是選舉大興。再後，注釋則有呂向五臣、馮光振、蕭嵩、陸善經等，續修則有卜長福、卜鄰之流，一時著述成林，然彼時雕版印刷尚在萌芽，至唐後期，偶有佛經、曆書、韻書之類雕印，文集傳聞有「模勒」白居易集，《文選》則未聞焉。故今日所能見敦煌出土卷子本無論白文無注、李善注、無名氏注本《文選》，還是《文選音》，以及發現於日本的古鈔《文選集注》，皆是六朝以來人寫本。《文選》的第一個刻本當是五代蜀相毋昭裔，命門人句中正、孫逢吉等書寫鏤板之本（《宋史·

西蜀孟氏世家》。學者據《宋彙要輯稿》（《崇儒》四）載景德四年始議刻李善注本，謂毋刻為五臣注本，說或可從，蓋自玄宗片言褒賞以後，唐至宋初流傳廣泛的確是五臣注三十卷本。

宋初重選，陸遊所謂「文人專意此書」，士子有「《文選》爛，秀才半」之語（《老學庵筆記》卷八）。慶曆後，文風丕變，然選學流風未沫。兩宋雕印事業昌盛，《文選》及選學專著的雕印亦突飛猛進。據尤袤《遂初堂書目》、晁公武《郡齋讀書志》、陳振孫《直齋書錄解題》、《宋史·藝文志》等著錄，《文選》類書摘豔之作，即有《文選事類》、《文選雙事》等六種，至於《文選》的雕印，筆者聞知即有十餘種。五臣注本有：天聖四年前行世平昌孟氏本（韓國影印《奎章閣所藏六臣注文選》、沈嚴《五臣注後序》）、南宋初，杭州開箋紙馬鋪鍾家刊本、紹興辛巳建陽陳八郎宅本，此外有「兩浙」本（亦見沈《後序》）；李善注本有：天聖七年國子監本，淳熙辛丑尤袤池州本。六臣注本最多，有：元祐九年秀州州學本、崇寧五年至政和元年廣都裴宅本、北宋末刊及紹興二十八年明州重修本、南宋初贛州州學刊及其重刊本。此外，又有廖瑩中建寧刻不知何家注本。兩宋《文選》刊印的特點，首先在地域廣。當時重要的刻書中心，浙江、四川、福建都有刊印，甚至江西、安徽、山東都起響應。就中以浙刻為重鎮。其次，都是官刻、

坊刻，尚未見私家刻。平昌孟氏校刊本，今世不傳，似亦是坊刻本。官刻書以書品寬大、校勘精審擅場，坊刻亦不乏精品。如廣都裴宅本，紙潤如玉、墨光如漆，字作顏體，「其鐫手於整齊之中寓流動之致」（《天祿琳琅書目》卷三），在北宋刊本中亦為上駟。此是坊刻代表。官刻則國子監本寫刻精絕，尤袤本筆力峻拔，古香氤氳。又附尤氏撰《李善與五臣同異》一卷。是《文選》有校勘專著之始。校勘之業，昉於劉向父子，然歷代皆各行其是。兩宋朝野重校勘，南渡之初有鄭樵《校讎略》始趨規範。校書由經史而文集，《考異》即是此風氣下的產物。《考異》既辟傳統選學辨析六臣異同一途，亦為《文選》板刻精校精刊樹其標的。此兩宋刻選可注意者一端。另一可注意的是，六臣本的出現和南渡以後形成的明州、贛州兩大板刻系統。理宗時，陳振孫《解題》始著錄「六臣注文選六十卷」，然六臣合併本的出現，實遠早於此。上文提到的六臣注秀州州學本之刻要早《解題》百餘年，又廣都裴宅本，鏤板竣工在政和元年，則至遲北宋已有合併之舉矣。廣都裴宅本，五臣注在前、李善注在後，是後人所謂明州本系統。南宋初刊行的贛州本則是李善注居前、五臣注在後。嗣後形成所謂贛州本系統。此後六臣注本，不從明州即依贛州。贛州本的出現使久已混淆糾纏的李善與五臣注，情況更趨複雜。恢復崇賢舊觀，成為選學的重要課題，遂有南宋淳熙間尤延之刻單李善注本。

而雕印亦因此多分門類。

八

蒙元享國日短，學術風氣，短時不能恢復，像其他學術一樣，選學的衰落不可避免。終元之世，未見有選學專著，著述中偶及選者，亦白珽之、李冶數家而已。然世祖不改漢制，尊崇孔子，興學立教，倡導刻書。上自中央與文署，下至路府郡縣儒學及各地書院，都尚刻書，私家及坊間亦一時風從。據錢大昕《補元史藝文志》，蒙元一朝雕印流通圖書達三千餘種，遠非全豹，亦可見雕印事業仍在發展。蒙元《文選》之刻，大德初有陳仁子茶陵書院刊印之《增補六臣注文選》六十卷，此本出宋建本，屬贛州本系統，又有《文選補遺》四十卷，開廣補先聲。延祐間有張伯顏池州本，此重刻尤氏李善注本。陳氏注釋與廣補並重，張氏力復崇賢舊貌，都是承唐宋餘緒，是為繼往，又有開來。陳氏茶陵本所謂「增補」，只是卷首增《諸儒議論》一卷，尚不足以言開來，然茶陵本雖出宋建本，而注文多有刪節，就簡從俗，不可不謂明人刻選之胚胎矣。又，方回撰《文選顏鮑謝詩評》四卷，取《文選》中顏延之、鮑照、謝靈運、謝瞻、謝惠連、謝朓之詩，各為論次。劉履撰《風雅翼》十四卷，包括選詩《補注》、《補遺》、《續編》，合補注與廣續於一身，方、劉兩家之作，與上陳仁子之就簡從俗，並可謂開來。方本未見元刻，據《四庫簡明目錄標注》引朱修伯說有明刻本，今傳系四庫館臣抄撮自

《永樂大典》者。

洎乎有明以八股取士，選學益衰。著述之家或輯注釋，或施評點，或採腴詞為類書，罕有發明選理者，明人不學，世有定評。然立國之初，詔除書籍稅，又「命有司博求古今書籍」（《明會要》卷二六），故明代印刷事業空前發達，《文選》及專著的雕印都超宋邁元，高潮疊起，初中晚期各有重心。初期，指正德以前。雕板的選題及風貌皆踵武元人。精楷趙體寫刻，天地頭寬大。選題唯一再翻刻劉氏《風雅翼》，有元明間上虞本、宣德九年陳本深本、正統間何景春本、天順四年本、弘治十四年王璽本，直至嘉靖初，還有蕭世賢本。此蓋因襲承舊，易於收功，能應一時之需。成化二十三年唐藩李善注本是今存明初期唯一全注本，亦系重刻元張伯顏本。嘉隆及萬曆初年，是謂中期。此期受前後七子文學復古思潮的影響，《文選》的雕印，大多重刻、覆刻宋元舊本。李善注本，大抵出張伯顏本。唐藩之後，有嘉靖元年金臺汪諒本、嘉靖四年晉藩養德書院本、隆慶五年朱碩熹重刻唐藩本、萬曆初晉藩文思堂重刻養德書院本等。六臣本贛州系統以茶陵本為鵠的，有嘉靖初蘇州本、二十八年洪梗清平山堂本、三十年新安潘唯時、潘唯德本，嘉靖間尚有何孟倫本。清平山堂本，隆萬間有項篤壽萬卷堂重刻本。二潘本，嘉靖間有吳勉學重修本、萬曆二年崔孔昕本，又萬曆六年徐成位重修崔孔昕本。一再

重刻，蠡斯孔繁，是中期《文選》雕印大戶。明州系統，有嘉靖間蘇州袁氏嘉趣堂翻廣都裴宅本。裴本又有無名氏翻刻及丁覲重刻本。唯五臣注本無嗣響。萬曆中葉以後，是謂後期。彼時世風澆薄，士子多不根於學，又不肯守舊，而務求勝於前人，故趨簡從俗之風大張。《文選》雕印就表現出多「纂注」、「約注」、「刪注」之本。如：張鳳翼《文選纂注》、王象乾《文選刪注》、孫鑛《文選淪注》、馮惟訥《選詩約注》等等。此類本子大多就六臣注刪繁就簡，又雜採諸家詮釋，所引不注出處，偶附己說，率高下在心，故不為世人所重。然一時亦十分熱鬧，張氏《纂注》屢被重刻，又派生出《評苑》、《評林》之本，疊床架屋，樂此不疲。趨簡從俗的另一種表現是白文本的出現。白文本的萌抵，大概是嘉靖時《文選音釋》本。踵此，隆慶有楚少鶴山房本、萬曆間有楚府刻本、吳彰本、張居仁本。乾脆刪去所有注文，雖似有返樸歸真的趣味，然於文選學，不能不說是一種倒退。前人有明人刻書而書亡說，這話當作具體分析。就《文選》刊印而言，大而言之，官刻之監本和坊刻本質量較差，而藩刻、私刻則多有佳槧。弘治間，蘇人楊循吉跋錢孔周藏北宋本《文選》云：「《文選》自隋唐以來莫不習之。予昔遊南都，求監本，率多漏缺不可讀。」（《汪氏珊瑚網法書題跋》卷十六）所謂監本，指南監本。南監刻書，往往有監生參與校對寫刻，又多舊本，質量勝北監，

世所周知，而今亦「率多漏缺不可讀」，則其校刊粗疏可知。官刻除監本外，據周弘祖《古今書刻》，都察院、山西布政司、蘇州府都刻有《文選》，應天府刻《六臣注文選》，今皆不見傳世，不能置評。至於坊刻，且不論魚魯帝虎，甚而至於妄改書名，刪節詞句，如晉藩本，萬歷時即被坊間改題《漢文選》以炫世。若就此類而言，說明刻書而書亡，其言雖刻亦不為誣。但藩刻與私刻卻不屬此例。明藩王財力雄厚，底本又多中央宋元舊刻之賜，複延名手校勘，故所刻多精本。上述唐藩本、晉藩本皆有重名，誠黃丕烈所謂可與宋版埒之黑口板。明代私刻《文選》以袁氏嘉趣堂本最有名。歷時十六年，所費不貲。擇工選藝，紙潤墨香，與裴宅本無毫髮之憾，「櫟刻甚精，校勘亦審，實與宋槧同工。」（《天祿琳琅書目》卷十）清內府藏偽宋本《文選》十部，其中九部即出袁本，正可證其之精善。萬曆後，刻書最興旺，有名的私家刻書如吳勉學、陳仁錫、毛子晉都刻印過《文選》，尤以毛氏汲古閣重刻張伯顏本影響最巨，清初重刻、覆刻莫不出此，亦明代私刻本之掉尾一振。這裏須插一句，明代坊刻《文選》亦非無佳刻，如金臺汪諒本，翻張伯顏本而能纖毫畢現，連朱筠、孫星衍、陸心源、楊紹和輩俱被瞞過，其精湛可見。多色套印是明代印刷技術的成就之一。套印技藝發軔早在元代，而推廣運用，實在明後期。萬曆前後，明人以批評圈點之法施於小說戲曲，亦用於《文

《選》等其他古籍，客觀上呼喚套印這一印刷新技藝。當時套印據點在浙江吳興，閔齊伋、凌濛初兩家都朱墨兩色套印過《選詩》、《選賦》，閔家還套印過專選《文選》散文的《文選後集》。兩家都延名家校審寫刻，紙用白棉，潔白如玉。不設行欄，以便批點評注。正文用墨，批點用朱，色彩斑斕，誠一時之精品。陳繼儒《史記鈔序》說：「自馮道、毋昭裔為相，一變而為雕版，布衣畢升再變而為活版，閔氏三變而為朱評。」套印技術的出現，確是我國古籍版刻史上一大轉機，在《文選》刊印上亦得到了反映。

明末大儒顧炎武，考證經史，旁綜藝文，所著《日知錄》，涉及《文選》雖不過五、六十條，然簡賅精密，實為清代選舉導夫先路。滿清帝王右文，康熙、雍正皆重刻書。內府有武英殿，外省有曹寅主持之揚州詩局等，刻雖不及《文選》，然康熙嘗命人書寫張伯顏本《文選》。書作袖珍，略更舊式，繕寫精工，與《佩文韻府》同一風致。清初，學者都事校讎，先後有潘耒、錢陸粲、何焯等輩校《文選》傳世，尤以何本風行天下。所用底本皆通行之毛氏汲古閣本。康熙二十五年，上元錢士澍重刻毛本，訂補罅漏，是毛本功臣。迨乎乾嘉，樸學大行，學者由校勘而小學，由群經子史而文集。這是一方面。另一方面，乾隆丁丑定制：科

場增試詩賦，《文選》再度與科舉挂起鉤來，乾嘉時鄉、會兩試二場限八韻詩一首，「詩題多出《文選》句」（陳鱣《簡莊文鈔》卷六），士子複肆力《文選》。乾隆又以帝王之尊，自乾隆十二年至三十五年間，先後命詞臣歐陽正煥、王際華、梁同治、張勳等校寫《文選》，有幅幾盈尺的大字本，亦有帳殿便攜之袖珍式，又有大小適中之本，皆端楷精寫，一絲不苟，誠內府球璧。上行下效，選學中興氣象，遠紹李唐。學者治選各因其長而辟門徑：從校勘入手，以恢復李注面目為己任，如姚范《援鶉堂筆記》、許巽行《文選筆記》、顧千里《文選考異》；以考據切入，以考辨李注是非為嚆矢，如張雲璈《選學膠言》、梁章鉅《文選旁證》、朱琯《文選集釋》；以小學治選，以字之假借，音之轉移，義之引申，析其同異，斷其是非，如余蕭客《文選音義》、薛傳均《文選古字通疏證》；段玉裁、王念孫兩家考校文字，則見於《說文解字注》、《讀書雜誌》、《廣雅疏證》諸書中。又有綜合研究治選，取選注以類別，發揮張揚，縷舉選學最詳，如汪師韓《文選理學權輿》、孫志祖《文選理學權輿補》；評點一路，如方廷珪《文選集成》、於光華《文選集評》，兼採明清以來諸家評論，同汪孫之書，一樣俾初學者入門，未可一概封殺也。選學中興，《文選》刊刻，用相翊助。乾隆初猶踵康雍，多重刻、覆